

纪念李薰同志*

周传典

我尊敬那些知识渊博之士,更敬仰发明创造者。李薰同志正是其中两者兼备的一位。五十年代初,我刚到鞍钢当见习员时,就听到过许多钢铁冶金专家和学者的事迹,李薰同志是我心中名次表上的第一位。这不仅因为他舍弃国外的优厚条件,毅然回国,致力于新中国钢铁科技事业的奠基和开拓,表现出他对祖国怀有深情的赤子之心,而且还因为他是知识渊博并有创造、发明的人。我知道他对钢中氢的研究成就卓著,为钢铁科技发展史写下新的篇章。

我与李薰同志生前的三次晤谈,令人难忘。

1952年冬,我第一次见到李薰同志是在我国第一座现代化的高炉——鞍钢八号旁。那时,我担任副厂长不久,鞍钢公司经理指派我接待刚由英国归来的学者李薰同志,我特别高兴,准备向他请教许多我不太明白的技术问题。在参观过程中,他询问高炉技术进步情况,并认为八号高炉技术装备水平比英国的高。那时我们用烧结矿冶炼低硅制钢铁已经取得成功,改变了日本人留下的鞍钢扩建规划中造块和炼钢工艺设计,自熔性烧结矿代替了方形团矿,预精炼炉改成了炼钢炉,使钢产量提高50%,他听后特别高兴,临时改变日程,取消了当天上午原订继续参观二炼钢厂的计划,要我同他继续详谈,当时国外一般生铁含硅较高,他对我们能把生铁含硅量大幅度降低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详细论述了在钢铁生产全过程中提高每一工序中间产品质量的重要意义,钢材的高质量取决于每道工序的高质量。他赞扬我们降低生铁含硅给炼钢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李薰同志的一席话迄今对我们仍有教益。三个多小时过去了,他谈笑风生,要不是陪同人员催他回去用餐,还会兴致勃勃地谈论下去。当时,我是一名技术人员,李薰同志已是中外闻名的学者,他平易近人,与我交谈,教诲良多,仅就这一点,足以想见他的为人,足以使我永远不忘。

1965年,我与李薰同志一起出席了冶金部召开的工作会议,那时我正在承德进行攀枝花矿的高炉冶炼试验,他对此颇感兴趣。一天晚上,他约我介绍试验工作情况。在此之前,我一直从事生产,未领导过科学实验,因此急切地向他求教。他说,第一要充分掌握文献资料,搜集前人做过的工作,仔细揣摩,定会找出一些有用的东西来;第二,获得了有关的广泛知识,就可以详加分析课题的难点所在,联系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拟定解决难点的方案;第三,试验要严格按方案进行,不断总结,不断探索,不断改进。他结合自己研究钢中氢的经历详细阐述。谆谆教诲使我茅塞顿开。按照他的意见,我们分析了高炉冶炼含钛矿石时炉渣变稠的原因,从苏联文献中找到了前人消弭变稠的办法。这促进我考虑肖米克教授从理论到实践早就解决了的问题,在中国的小高炉和电炉上进行试验也是有效的办法,而为什么当时在苏联没有成功呢?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出防止炉渣变稠的办法。我们从鞍钢炼低硅铁的经验中理出了防止变稠的措施,终于使试验获得成功。李薰同志的指点,不仅对我们那次试验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且对以后的工作,都有意义。前不久某青年送给我一篇试验方案和论文,我觉得他最大的不足是不知道前人的工作,没有自己的新见解,我请他按照李薰同志当年所讲的三条经验,重新考虑。过了两个月,他送来了第二稿,内容就大不相同了。

* 此文发表于《材料科学进展》,科学出版社,1985

1982年夏,李薰同志在长春主持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大会,我应邀参加,他又找我长谈。根据中央提出的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他认为中国科学院所属技术科学研究所,由于接触生产太少,因此缺乏解决经济建设实际问题的能力,如不从生产实践中积累数据和经验,学术水平也难以提高。于是他准备到几个钢铁厂去蹲点一段时间,第一站便是云贵川,重点去攀枝花。我很赞成他的意见,非常欢迎他到钢铁公司去解决问题,他启程去攀钢时,由于我去上海开会,因此不能陪他前往,但我告诉了该省冶金局和攀钢的经理,请他们安排好。他到达昆明,我是知道的,中国科学院给我打过电话。于是我再次从上海电告攀钢做好安排。但上海会毕,我却突然得悉李薰同志在昆明不幸病逝的消息。这使我为中国失去了一位卓越的冶金学家而感到万分惋惜和悲痛!

为了纪念李薰同志逝世两周年,我仅写了几段回忆,以表我对李薰同志的缅怀和悼念!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深夜